1945 年

柏拉图的哲学方法^{*}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必须先知道去做这件事情的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当然也不能例外，在研究哲学之前，必须知道研究哲学的方法。当然，也许有人说，我在研究哲学之初，根本并未先知道如何研究哲学，甚至我研究哲学已经为时很久了，仍然还是不知道如何研究哲学，所以不见得研究哲学必须以知道哲学方法为先决条件。诚然，许多已经有成就的哲学家也不必自知其是用何种方法在研究哲学，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没有一位真正研究哲学而没有他的方法者。说自己研究哲学之初没有哲学方法，以及说他在研究哲学时一直不知道哲学方法是什么者，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他自以为在研究哲学，而实际上他并没有研究哲学；一种是他正在研究哲

^{*} 本文系作者 1945 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哲学问题讨论会”的报告论文之一。

学期间,已在不自觉地使用着某种方法,只因为其不自觉,所以说没有哲学方法。

前面说有一种人,在其进行哲学研究时,不自觉其使用何种方法,也许他无意中选取的方法很正确,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能力很高强,因而这种哲学方法,他虽不自知却正确有效地帮助他解决若干哲学问题,甚至完成他整个的哲学系统。但我们说,这种不自知其哲学方法而研究哲学的人,虽然也可能有很好的研究所得,但至少有两种缺点:首先,因为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何种方法,便无法判别这种方法是否正确,如果方法错误,则其哲学研究的努力,或者是缘木求鱼,劳而无功,或者是南辕北辙,心劳力拙;其次,唯其不自知其方法,便无法善于使用其运用此种方法的能力。例如说,一个用分析法研究哲学的人,对于他原有的分析的能力,便不能充分发挥,更不会加以培养锤炼。所以我们说,研究哲学的人不但要有哲学方法,而且要自知其哲学方法。

为自知其哲学方法,自知其方法的性质是否正确、运用是否充分,当然应该从其哲学的根本态度着手讨论。因为一种看法一种态度下的哲学,就是一种哲学,对哲学的态度不同,其所谓哲学的性质就不同,不同性质的哲学,自然须用不同性质的方法去研究。有人批判摩尔(Moore)的分析法,说对于好些问题,你为何不用分析法去分析研究呢?摩尔答复道:有好些问题,我根本不感兴趣,另有好些问题,我正在寻求它适用的方法。摩尔因为对于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用以研究的方法也将不同,这表示哲学方法受对于哲学的根本看法的决定。自然,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也必定或多或少地,受其所用的哲学方法之影响。好比切牛肉与调乳油固然不能用同样的工具,而快刀与钝刀,也会切出不同的牛肉块。我们在此处不想讨论究竟是哲学的看法决定哲学的方法,还是哲学的方法影响哲学研究的结果,只想表示一点:就是要检讨哲学方法,似乎应该从哲学本身检讨起。不过本文的内容,不是从哲学本身检讨哲学方法,而是对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加以分析。希望在分析别人的哲学方法之后,能用批评的眼光,校正自己的方法;能以学习的态度,确定自己的方法。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则本文虽非对于哲学方法之纯理论的研究,却或许能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

大致说来,一个人的哲学,就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经验作某种解释而说出来的一个理论系统。我们所说的哲学方法,就是他说出来他的理论系统的方法。我们说哲学方法是哲学家说出来的他的哲学理论系统的方法,或许有人不赞同,因为哲学方法似乎应该是哲学家获得其哲学的方法,而获得其哲学的方法与说出其哲学的

方法,是判然两事。这种批评,我们当然可以同意,我们甚至于觉得哲学家究竟是先把捉到了哲学根本观点而后构成他的理论系统呢,还是说其理论系统循序渐进,而后达到他的哲学根本观点呢,这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出其理论系统的方法,当然不必是他获得其哲学的方法。不过,我们认为如果哲学家获得其哲学时所用的方法或经过的程序,与其说出其哲学思想时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则我们既不是那位哲学家本人,实在无法知道他在获得其哲学时究竟是用的何种方法(甚至于他本人,也许都不知道),我们对于大哲学家的哲学方法,便也根本无法说出来。不过我们现在退一步说,即使哲学家获得其哲学与说出其哲学的方法并不相同,但当其说出其哲学时,自然希望其哲学思想能够取信于人,能够使别人遵循着他头头是道的路线获得与他同样的哲学思想。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人希望别人前往某一目标而指示一条他认为不能到达该目标的路线,因此,我们认为一位哲学家说出其哲学的理论系统的方法,即便不是他本人获得其哲学的方法,至少是他认为可以获得其哲学的一种方法。唯其如此,于今研究柏拉图的哲学方法,需从其说出他的哲学理论系统的方法着手,一方面是不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也因可以如此。换句话说,我们舍此而外更无其他根据,同时这种根据,也还能相当显示他获得其哲学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柏拉图自己表示他的哲学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在形式上就是问答法,或对话法,所以柏拉图说出其哲学理论系统的全部著作几乎完全采用对话体裁。问答式的辩证法,与希腊当时的智者用以质疑辩难的方法,颇有类似,柏拉图之师,希腊三大哲学家的开山祖——苏格拉底就曾被人称为智者。其实,柏拉图的辩证与智者的辩难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柏拉图和智者分别使用他们的辩证与辩难,指出感觉的不可靠,指出感觉世界的变动不居、流转无常。一朵红花,我看见是红的,你看见它未必就是红的,即使我们都看见是红的,你所见与我所见的深浅与明暗程度也未必相同。一般人信任感官的可靠,遂误以为根据感官对感觉世界而有的感觉所构成的意见,也是靠得住的。智者固然大都以列举感官不可靠的实例来破除常人对于感觉世界真实性的迷信,柏拉图也未尝不竭力表示感觉世界之不真。《共和国》第七章里的洞穴之喻,说在洞穴里的人,由于目光被限制,只能看见事物的影子,就是比喻单凭感官认识世界的人,都看不见最真实的世界。所以就其不信任感官的认识能力而言,柏拉图的辩证与智者的辩难是相同的。

不过智者的质疑辩难,目的只在破除常人对于感觉世界的执着,柏拉图的辩证法,虽然也要如此,却不仅如此。柏拉图希望在用辩证法消极地破除了常人对于感觉世界的执着之后,更进而积极地认识理念的世界。感觉世界虽不可靠,但另有最可靠的理念世界,所以辩证法不仅是摧毁一切的大刀阔斧,而且是一副呈现理念世界的透视镜。正因为智者所用的质疑辩难与柏拉图所用的辩证法有如此的区别,

所以智者只能达到“认为万物尺度”的相对主义，而柏拉图则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至善”的绝对境界。

柏拉图的辩证法在形式上是问答法，当然不是说柏拉图必须借用别人实际的提问才能说出他的哲学。他的全部对话集可以说大部分是他假设的问答，我们只要看到虽然他的初期著作具有显著的戏剧色彩，而在晚些著作里，对于人物地点已经非常漠视，就可证明此说。我们并且还可以说，辩证法是否采取问答的形式，与辩证法之所以为辩证法没有实质的关系。据我们所知，柏拉图在致力哲学研究之前，曾经研究文学，他说出其哲学时，采取问答方式，可能只是表示他对戏剧的兴趣。所以辩证法究竟在实质上是一种什么方法，我们还要另加说明。

大致说来，辩证法就是逻辑的纯思法。这种方法，在纯粹思维中进行，而以逻辑为其推行的原则。所谓在纯粹思维中进行是说，不假感官协助，不赖观察实验证明。一切科学研究，除了数学之外，都靠感官来观察实验，而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则专以理性去思维辨析。人类的认识能力，大致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感官，一种是理性。有人以为感官所感觉的最真实，有人以为理性所思维的最真实，还有人以为感官和理性是人类认识能力之分不开的两个方面，不是两种能力。不过，感官所能感觉的只限于存在于时间空间里的特殊个物，而对于不居何时不占何地的共相，则完全无能为力。由这一点看，感官和理性，似乎却是各有其分别。柏拉图就是认真分别感官与理性为二物，而坚持信赖理性、摒弃感官的。

严格言之，任何知识都不能纯靠感官，都必须凭借理性的思维作用。我们看见一张桌子，如果不知道一张桌子则已，在知道那是一张桌子之时，我们实在已经超过了纯粹感觉而达于知觉，把那个称为桌子的东西称为桌子，已经是把它纳入到桌子概念之内，并且知道它具有桌子应具有的种种性质，我们已经在用理性的思维能力了。至于一切科学知识，更都是思维的结果。如果我们有心理学中所说的纯感觉或佛学中所说的“现量”，不含有丝毫理性的思维作用，而那种纯感觉与“现量”也不能说是知识。既然一切知识都需要使用思维能力，科学方法与柏拉图的辩证法岂非没有分别了？

柏拉图对于他自己的辩证法与科学方法之不同，有简要的说明：第一，科学方法固然也必须有理性的思维，但科学的思维，事先须以观察实验的事实为根据，事中须以观察实验的事实为参考，事后须以观察实验的事实为佐证，换句话说，科学方法中的理性思维不能须臾离开感官的协助。但辩证法则不然。柏拉图在《共和国》第七章第532节里说：“当一个人，单凭理性之光，不借感官之助，开始去发现绝对，继续前进，以至由纯粹智慧，而达于至善的观念。”柏拉图所说“单凭理性之光不借感官之助”的人，就是指作哲学研究的人。所以辩证法与科学方法相同之处，

在于皆凭理性之光，而相异之处在于辩证法不借感性之助。

但科学研究中，也有不借助感官之助的，例如算学、几何等，都以自明的公理，作纯理的推论，辩证法与数学的研究法区别何在呢？柏拉图至此提出第二种分别：数学以假设为根据，进行推论，而辩证法则不根据假设而反要推敲这些假设。学算学的人承认数字有两种：有奇数，有偶数。根据奇数和偶数而知道奇数加奇数得到偶数，偶数再加偶数，还得偶数，偶数加奇数，必定得奇数。学几何的人承认角可分为三种：有直角，有大于直角的钝角，有小于直角的锐角。根据这三种角而知道直角加任何锐角必得钝角，大于直角的任何钝角减直角必得锐角，等等。但什么是奇数偶数，什么是直角钝角锐角，学算学与几何的人认为这是一望而知，无需解释的自明的东西。数学就根据这些自明的假设，层层推演得到种种结论，建立其全盘的数学知识。但就研究哲学的人看来，数学的方法虽然不借助于感官，却假手于假设，数学的知识，只能说是由假设推演出来的结论，而不是第一意或第一原理。在《共和国》第六章第 510 节里，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对话，苏格拉底说：“我想你一定知道，像研究几何、算学的人，假定奇数符号、偶数符号、三种角等，他们自以为人人都知道它们了，于是采用为他们的假设，而不予以任何解释，直接从它们出发前进，由已知推未知，在贯通一致的条件下，最后他们得到他们的结论。”其实，“他们只梦想到实有而已，对于那些不加思考即行引用而不能予以解释的假设，他们一天不丢开，就一天不能把捉到真正的实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第一原理，而其结论与中间阶段又都是经其所不知中引申出来的，他如何能想象这样一种虚构的东西可以成为学问呢？”（见《共和国》第七章第 533 节）“然则只有辩证法，直趋于第一原理，它可说是唯一不用假设因而根基稳固的学科了。”（来源同上）

我们对于柏拉图的辩证法与科学方法的不同，已如上述，现在的问题是柏拉图持其辩证法如何进行哲学研究呢？换句话说，柏拉图不承认一切科学假设，要去推敲假设，靠什么能力去推敲呢？如果说柏拉图不信任感觉能力，只依赖理性的力量，而理性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我们说，理性的原则是逻辑。这就是所以我们前面说辩证法以逻辑为其推行原则之故。

或者有人说，在柏拉图的时候，关于逻辑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希腊的传统逻辑到柏拉图的大弟子亚里士多德手上，才成为系统，怎能说柏拉图当时就已采用逻辑为其辩证法的推行原则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方面的解答。一方面，我们要说，希腊的逻辑虽然到亚里士多德手里才成立，但在柏拉图的思想里已经大致成熟，柏拉图就曾鲜明地表示同一律的重要，又曾确切地说出矛盾律是什么。

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去指明的事物，一直在变动不居，其初它是‘那样’，转瞬间它是如此这般，当我们的话还在口里没说完时，它已变成别的了，已经跑开，不

复是原来的同一件事物,那么要想正确地说些什么还有可能吗?”(见《克拉底鲁》第439节)这是柏拉图的同一律的思想。

“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显然不能既动作又被动作,或者说,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事物,不能产生相反的关系。”(见《共和国》第四章)这是柏拉图的矛盾律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可以以逻辑为推行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仍还要说,我们所谓的以逻辑为推行原则,当然不是说他把逻辑里的命题都一一搬进他的哲学里,而只是说他想用逻辑的精神,来推敲哲学问题。逻辑的精神究竟是怎样的精神,颇不易说,不过我们总可以说逻辑是要求知识中消极的无矛盾,积极的有必然性。柏拉图思想是否皆是必然的,当然很成问题,但至少是无矛盾的。

说到这里,有人要说,任何根据理性而得的思想应该都是无矛盾的,若是某人的思想里矛盾百出,则我们只能说那是胡思乱想,不能说是思想,任何可称为思想的思想,既然都应该无矛盾,那么根据柏拉图思想之无矛盾而说他致此思想是采用逻辑原则,实在不算理由,因为所谓逻辑,本来就是思想的法则。

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们说柏拉图的辩证法以逻辑为原则,还有特别的意思。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逻辑一方面是知识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实有的原则,柏拉图不仅把逻辑原理作为思想的法则,并且视之为世界的秩序。思想有如何的法则,世界也有如何的恰恰相应的秩序。至于为何思想法则能与世界秩序相应,柏拉图没有说,不过照我们看,柏拉图似乎有意以为思想法则的基础,本来就在世界秩序的身上,他充分地使用逻辑原则,乃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我们特别要说他的辩证法是逻辑的。

关于他实际上怎样运用逻辑的思维法去进行哲学研究,我们随后再进行说明。现在我们只归纳起来说,柏拉图的哲学方法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在形式上采取问答对话的方式,在实质上是逻辑的纯思的,与希腊智者的辩难法不同,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法也不同。它不借感官之协助,不以假设为根据,而是以纯粹思维直趋第一原理的方式。

三

以上把柏拉图的所谓辩证法的性质大概说过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他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说出或建立或获得他的哲学系统。就哲学史分析,历来哲学系统的起点,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自经验开始,一是自超经验开始。自经验开始的,循序诱导,终于要达到超越经验的抽象原则;自超经验开始的,逐渐繁衍,总要能够解释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例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同是大陆理性派的哲学家,可

是他们的出发点迥然不同，笛卡尔从经验中的“我思”推到“我在”，更由“我在”推到“神在”，万物在；斯宾诺莎却是从超经验的上帝，或永恒的客体，说到实体的精神与物质的属性，又从实体的属性说到客体的状态，更由无限状态说到有限状态，说到包罗万象的世界。那么，柏拉图是从何处开始运用其辩证法的呢？

虽然在《智者篇》里，他也曾经从抽象的原则开始说起，但那不是他的哲学的开始，他似乎是从经验开始运用他的辩证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任何一个经验都是感觉与理性的混合品。柏拉图就是要以辩证法提出经验里感觉的障碍，呈现理性的成分。比方我们看见一张桌子，我们有一个“这是一张桌子”的经验判断。这是从感官得来的东西，但什么是“桌子”呢？对于“什么是桌子”，或者还不易产生问题，因为我们容易想到“桌子”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米黄色长方形的这个东西，可是如果我觉得“这张桌子是大的”就比较麻烦了，什么是“大的”呢？相传有一头水牛和一只老鼠结拜兄弟，都想做大哥，争执不下。水牛心想自己的形体比老鼠大得多，便提议以大小定长幼，并且让第三者来评判大小。老鼠不得已跟在水牛后面，走到大街上，看街上人究竟说谁大，水牛满以为这样一来，一定是自己胜利了。不料街上人看见水牛都没说什么，可是看到老鼠，却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好大的老鼠呀！”于是老鼠因为人家都说它大而做了大哥。这个故事表示“大”“小”是相对的。老鼠与水牛比，当然水牛大老鼠小，但那个结拜兄弟的老鼠与其他相比，就不一定是小，也许是大，水牛与老鼠比是大，而水牛与象比，又是小。老鼠可以又小又大，水牛可以又大又小，这是否是一种矛盾呢？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就很容易发生“什么是所谓的大，什么是所谓的小”的问题。其他如“同与异”“一与多”“静与动”等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在座诸位同学，就研究哲学而言，我们是“同”，但就姓名、籍贯等而言，我们又是“异”。这张桌子在教室里的许多东西中是“一”，而它有桌面有桌脚，它本身又是“多”，总而言之，当我们有一个“这张桌子是大的”这类判断时，感觉容易混淆矛盾，就容易产生所谓“大”是什么、所谓“小”是什么这类所谓“什么是什么”的问题。

产生所谓“什么是什么”这类问题本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柏拉图在《曼奴篇》里，就曾记载曼奴与苏格拉底说过这样一段话，曼奴说：“苏格拉底，你如何会对你所不知道的提问呢？你将以什么为你提问的题目呢？如果你觉得你想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呢？”苏格拉底说：“曼奴，我懂得你的意思，但你已引起了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了。你是说，一个人既不能问他所知道的，也不能问他所不知道的，因为如果他知道，他无需乎问；如果他不知道，他不能够问，因为他不知道他所要问的真正题目是什么。”曼奴说：“对的，这不是很好的论证吗？”苏格拉底随后答复曼奴，说例如“大”“小”“同”“异”“一”“多”等这类概念是人的灵魂里

前生本有的,不过现世已经忘记了,说是知道吧,现在已经知道了,说不知道,其实原来是知道的。无论知道或不知道都不能提问,但现在的情形是不能说是不知道,也不能说是知道,所以还是可以提问的。提问的目的,旨在唤起人之灵魂的回忆而已。

大致说来,凡是提出问题,提问的人确乎都是介于似乎知道与不知道之间。不过我们不必如苏格拉底所说假设灵魂本知而现在忘记了。我们的意思以为:例如“大”与“小”、“同”与“异”、“一”与“多”、“动”与“静”等这类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里,本来经常都在使用着,虽然经常在使用着但却习而不察,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知道如何在经验里使用这些概念,但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所谓“小”,所谓“同”,所谓“异”,等等。换句话说,不知道“大”之所以为大,“小”之所以为小,“同”之所以为“同”,“异”之所以为“异”。再换句话说,不知道“大”“小”“同”“异”等概念的所指。甚至不但不知道什么是这些概念的所指,简直就不知道这些概念是有所指的。所以不作哲学探讨的人,就没有何谓大、何谓小、何谓同、何谓异这类问题。不过虽然普通人不知道这些概念何所指或有所指,但这些概念却是人人使用的,既是人人都在使用,则人人都有提问它们何所指的可能。不过这种提问不是人人都有而已。而这种提问,与其说是回忆的原因,毋宁说是反省的结果。

前面说过“这张桌子是大的”这类经验是人人都有的,但不必人人都产生“什么是所谓大”这类反省。柏拉图承认在普通经验中提出超经验的问题极端重要,同时,也极其困难。柏拉图说人若先学算学、平面几何、天文学等科学,就比较容易。其实学算学或天文的人,未必就比较容易提出上述问题。不过我们由此可以推想柏拉图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类问题,大致是从其研究算学而得到启示的,并且是先产生“什么是所谓大”“什么是所谓小”这类问题,然后才有“什么是所谓桌子”“什么是所谓人”这类问题。

凡是知道“什么是所谓大”“什么是所谓桌子”的人,必然已经知道“有所谓大”“有所谓桌子”。因为“什么是所谓大”这一命题蕴涵着“有所谓大”这个命题,如果不知道“有所谓大”,根本就不能问“什么是所谓大”。所以能问“什么是所谓大”的人,必定已经知道所谓“大”“小”等这些我们日常应用的概念,是有所谓或有所指的。所谓的或所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各概念所代表的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理念。一个人知道有理念,柏拉图以为他的心灵的眼睛已经由蒙昧的沼泽中解放出来,他的灵魂已经由感觉世界上升到理性世界,他已经跨入哲学的园地了。知道有理念,柏拉图的辩证法,可以说已经尽了它初步的或大部分的效能,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

四

柏拉图用辩证法使人知道有理念之后,更进一步要帮助人知道每一个别的理念具有何种性质。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一事物的个别的理念,可以从两方面去明了:一方面是从该理念与其他理念之关系上去明了其特征,另一方面是从该理念之内部结构上去明了。柏拉图为便于从这两方面去明了理念,特别提出两个运用辩证法的技术或原则。他说:“第一原则是综括原则,所谓综括原则,是以一个理念去笼罩分散的特殊个物……第二原则是分解原则,所谓分解原则,不是以强力割裂为部分,而是依照自然的组成划分为种别。”(见《斐杜拉斯篇》第565节)苏格拉底说:“我自己就是一位非常爱好这些分解与综括历程的人。这些历程帮助我思,也帮助我辨。……如果谁有这种技术,我照例要称他为辩证专家。”(见《斐杜拉斯篇》第565节)这里所说的综括原则,就是研究理念与理念之间关系的办法。分解原则,就是研究理念之内部特性的办法。

这两种办法,其方向显然不同。我们似乎可以说分解原则是向下的,而综括原则是向上的。但虽然一分一合,一向下一向上,却分用则两缺,合用则双全。所以柏拉图在《政治家篇》第585节里说:“正当的途径是:如果一个人首先看到事物的统一,于是继续提问,不至其所含一切构成类别的差异完全呈现,决不停止,并且他不能以在杂多的事物中见到分歧为满足,而应该了解所有在一个相似的范围内具有任何相似点的一切事物,并将其包括到一个单一的类里去,方才罢手。”这就是说,我们要先能从同中见到异之后再从异中找到同。先分析出一个理念所以与其他理念不同的所在,然后再用更高的理念把若干不同的理念综括起来,归于一个理念之下。

现在我们先来看柏拉图怎样分解。柏拉图所分解的就是名词,因为我们对于理念的知识就是概念,说出概念的语言,就是名词。直接分解的是名词,间接分解的就是理念,所以说,“辨名析理”。分解名词,目的就在找出该名词与其他名词不同之处,也就是要找出该名词之独特性,这就是要找出该名词的定义。

例如,我们要给“学生”这个名词下定义,首先就得能“看到事的同一”,要能看出学生与先生、与校工、与满街上行走的同为“人”。“人”有各种不同的类,我们可以分为无知识的类与有知识的类;有知识的类,又可分为有知识而不再求知识的类与有知识而继续求知识的类;求知识的类,又可分为自己求知识与从师求知识的类。学生固然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也不是以自己现有知识为满足的人,也不是想求知识而自己想在生活实践中找经验而不求教于人的人。如此逐层解析,直到“所含的一切构成类别的差异完全发现”时,我们就得到“学生”的定义,大致是从师求知识的人。

上面关于“学生”这个定义,也许有人说不确切,我们承认。其所以或者不够确切者,乃是因为分类不够细密,类别分得愈细密,则所得到的定义愈确切,而我们对理念也愈有清晰的了解。照理论上说,下一名词的定义,应该呈现“所含的一切构成类别的差异”,根据一切差异,分解出一切所含的类别。然后所得到的定义才最确切最完全。若是我们所呈现的差异,只是一切所含的差异中之几分之几,所分出的类,自然也只是一切所含的类中之几分之几,所得到的定义的确切性,也不会最完全,也只能有几分之几的确切。所以在《菲利普斯篇》里,苏格拉底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想象统一中的众多,既嫌太快,又嫌太慢。他们因为没有方法,无论一中求多,或多中求一,都是如此,从统一立刻达到无限,完全不知道中间的阶段。我要重复说一遍,诡辩的技术与真正的辩证法之不同,就在这里。”

究竟根据每一差别,应该分为几类,柏拉图自己的辩证大概都是分为两类。希腊的传统逻辑是二值系统的逻辑,遇到每一差别点分割为有该特点与无该特点的两类,本是自然的办法。所以在《政治家篇》里说,我们应该从中间分,因为从中间分,我们更易于得到类,不过他同时又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从中间采用二分法,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雕刻它们。怎样雕刻呢?这就是他在分解原则里所说的,要“依照自然的组成,划分为类别”,如果自然的组成,不宜于分为两类,而我们定要分为两类,那就是所谓“以强力割裂为部分”,所分解出来的便不是类,而只是部分了。其实在我们看来,在分类的时候,是否分为两类,并不成问题,其主要的关键,只在其所分的类是否穷尽一个理念下所含有的一切类,换句话说,只看是否违反排中律。在不违反排中律的原则下,所分解出来的应该都是无所谓哪是类,哪是部分。

现在我们再来看柏拉图怎样综括。依照前面所说柏拉图自己的说法,综括就是以理念笼罩着若干特殊的个物,那就是说,要从异中见其同。要在分散中求其统一。例如,学生与教师是不同的两类个物,学生是学习知识的,教师是教授知识的,而他们都与知识有关,可用“与知识有关的人”这一理念笼罩之。与知识有关的人及与知识无关的人,互不相同,而同为“人”,可用“人”这一理念笼罩之。人与牛马鸡犬不同,但同为动物,可用“动物”这一理念笼罩之。动物与花木不同,但同为生物,可用“生物”这一理念笼罩之。如此层层笼罩意义概括,推演至于善的理念,而止于至善。这才是柏拉图辩证法运用的极致。这才到达柏拉图哲学的顶点,所以他说:“由纯粹智慧达到至善”,“终于呈现自己达于理智世界的极端”。(见《共和国》第七章第 532 节)

不过翻遍柏拉图的著作,找不出他对综括原则作以上这样应用的实例。只有在《政治家篇》里,把政治家比为织布的人,由政治家与织布者之异,以见二者之同。前者治理人民,后者治理织机,治理的对象各异,而其为治理则一。但在这实例中,